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史安娜^{1,2},刘希佳¹

(1.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2. 河海大学技术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是利用金融工具支持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资源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效能。基于系统论,围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要素供给(资源供给和制度供给)与联结对系统功能的影响问题,采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与营商环境作为代理变量,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8—2020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存在要素供给与要素联结的“弱资弱制-弱资强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和“弱资弱制-强资弱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两条实现路径,均可打破经济系统发展中的资源依赖(结构性依赖与过程性依赖),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较好的营商环境会强化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和政治关联效应发挥的作用更强。

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资源供给;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3)01-0109-11

一、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时,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第一条,并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2]。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阻、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依旧存在^[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2]。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2年6月和9月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创业投资;鼓励保险资金等依法投资创投基金,着力以消费和投资拉需求、促进社会投资、以投资带消费^[4-5]。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立足实

引用本文:史安娜,刘希佳.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109-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GL023)

作者简介:史安娜(1962—),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研究。E-mail:anshi@hhu.edu.cn

体经济,政府引导基金是我国政府利用金融工具支持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抓手^[6]。截至2022年末,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累计总数量为1 531只,自身规模累计达2.74亿元,新设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和自身规模均超过前一年。2013—2022年,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增加1 318只,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4.50%;政府引导基金自身规模增加26 371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44.34%。政府引导基金过往10年增长整体迅速且较为稳定,有效助力了股权投资等领域的发展^[7]。2022年10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发改投资[2022]1652号)提出,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8]。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财政资金资源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提高政策效能^[3]。在此背景下,研究高质量发展系统中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如何更好地发挥功效,以及如何通过营商环境等制度供给的提升助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发挥功效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9]。学者们认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设好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和收入分配、区域发展、绿色发展、全面开放体系,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10]。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异质充足的资源与优质完善的制度这两个方面要素的供给,因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系统的功能,需深入研究两大要素——资源供给与制度供给要素的供给与联结机制。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主要围绕着资源供给与制度供给两条主线展开^[11]。作为实现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科技型初创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资源约束是此类企业最为关注却又最难突破的瓶颈,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供给是研究重点之一^[12-13]。关于资源供给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强调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引导效应

与风险共担效应^[14],对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供给作用均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但鲜有提及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作用。洪银兴提出,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建立增加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15]。在资金资源供给层面,韦东明等提出财政垂直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16];王辉等以引导基金政策出台和引导基金参股创投机构作为外生事件冲击,从创投行业和创业企业两个层面对引导基金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估,研究发现引导基金政策的出台及其创投行业的参与显著促进了行业募资和投资活动,扩大了行业规模,引导基金能引导创投机构投向科技型企业^[17]。在技术资源供给层面,刘友金等发现应当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研发和控制核心技术,努力培育领先企业,主动引导制定产业标准体系,改变价值链竞争的国际游戏规则,掌握价值链治理权,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换道超车”,以“中部崛起”带动“两端抬高”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18-19]。在数据资源供给层面,沈坤荣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数字金融不仅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可行途径,而且借助互联网技术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企业赋值、为产业赋能,是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戴双兴提出,我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完善数据要素产权界定,着力打破“数据孤岛”困境,健全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提升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效能,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21]。在人力资源供给层面,陈抗等提出,必须紧扣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不断创新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和人力资源开发模式^[22]。

一个重大商业模式的出现,一种全新经济增长函数的实现,一个系统功能的革命式改善都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供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1]。营商环境作为制度供给的一个微观方面,对创新要素和知识扩散提供了重要支撑,优化了各类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有助于充分挖掘创新意愿和将意愿转化为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打破行政垄断,切断不良政治关联所带来的寻租机会,提高市场活力。当营商环境水平较低时,内需潜力无法得到充分激活,各类创新要素无法重新组合,配置效率得不到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受到抑制。目前对营商环境的研究均侧重于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而忽视了营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情境因素在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在市场制度供给层面,冯烽从开发区良好的发展格局、富集的市场主体、领先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生产配套能力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阐述了开发区作为“双循环”战略担当的现实逻辑与可行性^[23]。在政治制度供给层面,任保平等认为,新经济的发展缺乏制度保障,无法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政府政策的制定会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19];刘军等认为,营商环境优化改善了企业面临的政企关系和商业关系,进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且政企关系的作用大于商业关系^[24];后向东研究认为,市场主体拟从事特定经营活动时,需要对特定领域的制度体系有较为准确的了解和把握^[25],通过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引导资源向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流动,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26]。在经济制度供给层面,宁朝山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化等控制变量对区域制造业质量收敛起到明显促进作用^[27];于文超等研究表明,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缓解不确定性冲击、保持经营活力的保障^[28];夏后学等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减少了企业寻租行为,有利于企业开展市场创新^[29];冯涛等提出,营商环境改善可以加强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30]。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方面,许志端等研究发现在营商环境良好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31]。

总体看来,以往研究普遍强调了要素供给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并认识到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中的资源与制度要素是最重要的两种要素供给,但关于要素间联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的讨论还需拓展。此外,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缺乏从整个系统角度的整合探究,不利于理解系统中要素构成与要素联结对系统功能的交互赋能过程。本研究旨在从研究情境和研究深度上进行拓展:第一,立足系统论,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要素、联结、功能,研究系统要素联结对功能的影响,拓展了系统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深入理解资源要素与制度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交互赋能的内在机理和科学规律,为资源约束下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为更好地发挥不同要素间联结优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学理基础与实践依据。第二,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从资源供给与制度供给双视角下探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更全面地系统揭示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资源供给与要素供给通过打破结构性依赖与过程性依赖,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提出要素供给与要素联结中的“弱资弱制-弱资强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和“弱资弱制-强资弱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这两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拓展了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情境。第三,丰富了营商环境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营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情境因素在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第四,拓展了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研究,强调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有利于区域或产业构建政治关联网络,发挥制度供给作用。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1. 资源供给和制度供给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资源依赖理论中,经济主体对资源的依赖主要分为结构性依赖与过程性依赖,结构性依赖主要是内生性依赖,要打破结构性依赖,在主体内部进行资源搜索与资源拼凑,属于较低级

别的资源依赖,但是过程性依赖对经济主体发展过程中资源异质性更为关注,要打破过程性依赖,主体不仅需要关注组织内部资源重组,还需对外去挖掘、拼凑、联结更为异质和高级的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科技型初创企业主体作为重要的微观主体,需打破资源依赖是资源函数重构的过程,联合组织内外多主体进行价值共创。在资源供给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主要遵循“资源拼凑-资源搜索-资源重组-价值共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各主体都需要围绕打破资源依赖进行价值共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资源供给视角看,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科技型初创企业而言,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出现使优质资金资源的高效配置成为现实,有效鼓励了民间资本进入科技型初创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有助于经济主体打破资源结构性依赖^[32]。从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所具有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政治关联效应这3个效应来看,除了具有资源供给功能,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还兼具制度供给功能^[33]。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有利于支撑科技型初创企业等经济主体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34]。例如,科技型企业的合法性获得、政治关联渠道建构、鼓励其社会责任履行等,都是和资源供给同等重要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据此,提出假说1: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制度,制度的完善性与优越性能保障经济优质稳健成长。制度供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关键。在制度供给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主要遵循“制度提供-制度协同-制度优化-价值共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营商环境作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扮演着多重制度供给的角色,这也是本研究选择营商环境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制度供给代理变量的主要原因^[35]。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重塑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存在要素供给与要素联结的“弱资弱制-弱资强制-强资强制-

系统功能改善”和“弱资弱制-强资弱制-强资强制-系统功能改善”两条实现路径,不论是资源供给还是制度供给,都通过打破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结构性依赖和过程性依赖来实现。具体来看,政府创投引导基金通过打破资源结构性与过程性依赖,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兼具资源供给(资金引导和风险共担效应)与制度供给(政治关联效应)双重功能。除了进行资源供给,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有利于区域或产业构建政治关联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创投基金的政治关联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制度供给^[33]。

从理论角度看,支持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作用的理论假说主要有两个:信号发送假说和良性循环假说。到底是信号发送假说和良性循环假说所支持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政治关联效应”起作用,还是反对者所支持的“资金挤出效应”起作用,需结合具体情境分析。而营商环境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供给,有利于集聚创新创业资源、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和信息技术扩散,优化各类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可在一定程度上纾解“资金挤出效应”困境,强化“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政治关联效应”。因此,当营商环境越好时,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力度越强。据此,提出假说2:较低的营商环境水平会抑制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资源与制度供给双重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要素供给-要素联结-系统功能”过程解析如下(图1)。

三、研究设计

1. 变量选取与测度

基于理论分析和假设,选取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作为解释变量。从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功能效应来看,主要有3个效应: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政治关联效应。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测度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将其划分为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政治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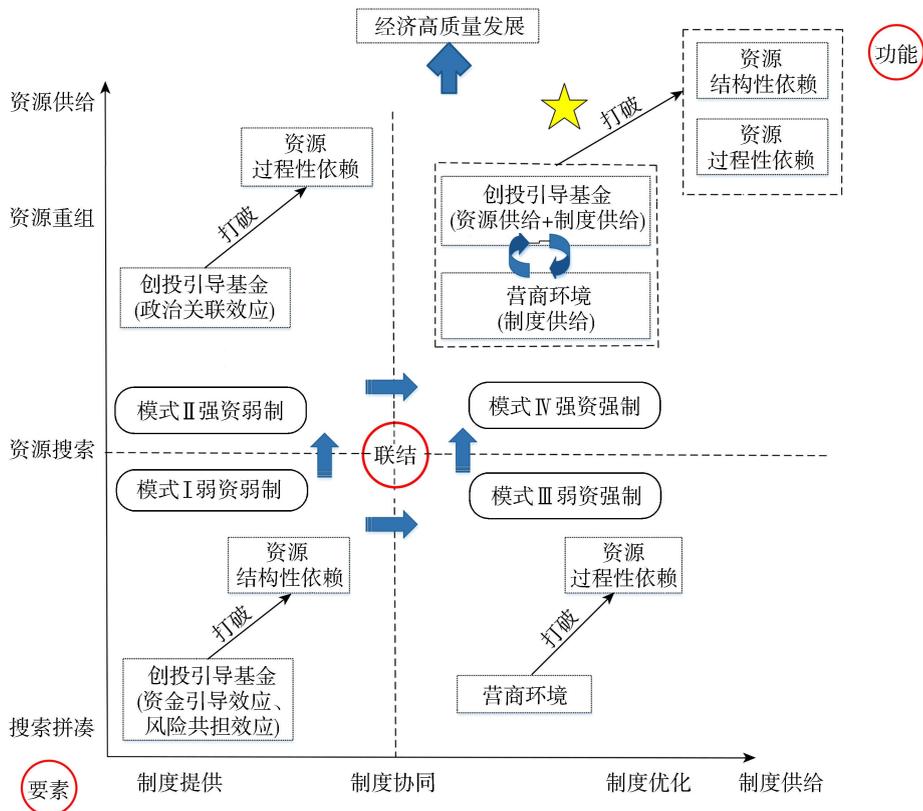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要素供给-要素联结-系统功能”过程解析

效应进行分别测度。其中,参照杨敏利等的做法,分别将地区年度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民间资金引导数量、地区年度接受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扶持的企业平均资金回报率、地区年度企业参与或构建的政治关联频次数量总和作为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政治关联效应的代理变量^[36]。核心调节变量营商环境指数则参照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方法,使用区域内高管人员每周花费在处理行政管理条例上的时间来衡量。

本研究核心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多层多维性,目前学界对其测度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认知。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或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所达到的额外的生产效率,这部分额外生产效率恰恰是来自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质不谋而合的创新与技术所带来的技术提升,相对于其他经济效率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衡量经济效率。同时,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客观性,选取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测算方法上,采用了蔡昉等学者的做法,使用索洛余值法,基于省际层面数据来计算各个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37-39]。考虑所投入的劳动与资

本等生产要素的异质性,构建如下科布道格拉斯函数:

$$Y_{i,t} = A_{i,t} K_{i,t}^\alpha L_{i,t}^\beta \quad (1)$$

式中: Y 为总产出; A 为全要素生产率; i, t 分别表示区域与年份; K, L 分别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 α, β 分别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将式(1)两边同时取对数,进行估计可以得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不同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A_{i,t} = \frac{Y_{i,t}}{K_{i,t}^\alpha L_{i,t}^\beta} \quad (2)$$

式中:总产量 Y 用各省份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分别用地区就业总人数与地区资本存量来表示,其中地区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选用大部分学者常用的永续盘存估算法得到,具体公式为:

$$K_t = I_t + (1 - \delta) K_{t-1} \quad (3)$$

式中: δ 为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参照聂长飞等^[40]的取值,将 δ 取值为 9.6%; I 为固定资产总额;期初资本存量为 $K_0 = I_0 / p + \delta$; p 为固定资产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

2. 模型设计

为考察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构建模型(4):

$$Q_{i,t} = \beta_0 + \beta_1 G_{i,t} + \beta_2 E_{i,t} + \beta_3 R_{i,t} + \beta_4 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中: $Q_{i,t}$ 第 i 个区域 t 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G_{i,t}$ 、 $E_{i,t}$ 、 $R_{i,t}$ 分别为第 i 个区域 t 时期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引导效果、投资效率、政治关联; 回归系数 β_1 、 β_2 、 β_3 分别为引导效果、投资效率、政治关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C_{i,t}$ 为控制变量。为消除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并使用 GMM 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模型(4)可以进一步改进为模型(5):

$$Q_{i,t} = \beta_0 + \beta_1 Q_{i,t-1} + \beta_2 G_{i,t} + \beta_3 E_{i,t} + \beta_4 R_{i,t} + \beta_5 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为考察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模型(5)中加入营商环境指数作调节变量,并同时加入营商环境与引导效果、投资效率、政治关联的乘积项,由此构建模型(6):

$$Q_{i,t} = \beta_0 + \beta_1 Q_{i,t-1} + \beta_2 G_{i,t} + \beta_3 E_{i,t} + \beta_4 R_{i,t} + \beta_5 B_{i,t} + \beta_6 G_{i,t} B_{i,t} + \beta_7 E_{i,t} B_{i,t} + \beta_8 R_{i,t} B_{i,t} + \beta_9 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式中: $B_{i,t}$ 第 i 个区域 t 时期的营商环境; β_5 为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G_{i,t} B_{i,t}$ 、 $E_{i,t} B_{i,t}$ 、 $R_{i,t} B_{i,t}$ 分别表示营商环境与引导效果、投资效率、政治关联的乘积项,回归系数 β_6 、 β_7 、 β_8 分别表示营商环境在引导效果、投资效率、政治

关联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为我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与可得性,剔除新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2008—2020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数据来源于清科私募通、CVSource 数据库、WIND 数据库;政治关联方面的数据来自企业官方网站新闻报道与百度搜索交叉检索所;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各省统计局官方网站、各省统计年鉴和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并对异常值进行了剔除。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数据均处于合理区间。由表 1 可知,目前我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普遍较低;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引导效果、投资效率和政治关联标准差分别为 2.308、2.924 和 0.870,说明我国各区域间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引导效果、投资效率和政治关联差异较大。

四、实证分析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信号对创投基金可能存在“虹吸”作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模型存在部分内生性问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类别	符号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Q	经济高质量发展	$A_{i,t} = \frac{Y_{i,t}}{K_{i,t}^\alpha L_{i,t}^\beta}$	1.248	0.233	0.197	2.336
解释变量	G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引导效果	地区年度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民间资金引导数量	0.962	2.308	0.000	21.000
	E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投资效率	地区年度接受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扶持的企业平均资金回报率	1.941	2.924	0.003	29.250
	R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治关联	地区年度企业参与或构建的政治关联频次数量总和与企业数量比值(取对数)	6.006	0.870	0.370	20.200
调节变量	B	营商环境指数	区域内高管人员每天花费在处理行政管理条例上时间(小时数)	0.184	0.167	0.066	0.434
控制变量	C_1	政府干预程度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 GDP 比重	0.251	0.107	0.100	0.760
	C_2	市场化指数	内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值	7.770	1.708	3.371	11.540
	C_3	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0.274	0.307	0.008	1.597
	C_4	人力资本水平	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 小学学历人数×6+中学×9+(高中+中职)×12+(大专及以上学历)×16 与总人数的比值	9.019	0.956	6.764	12.780

题。原因是当某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越有成效或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好时,会释放出该区域具有较好的制度环境、较宽松自由的要素流动渠道、较成熟的创业创新平台等一系列积极信号,这将会极大地降低潜在投资机构(包括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信息不对称引致的系统性风险的顾虑,从而反过来影响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该区域的资金引导效果、投资效率、政治关联成效。

基于我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8—2020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模型(5)(6)进行基准回归(表 2)。为验证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投资效率)、政治关联效应,对模型(5)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2 中第 1 列、第 2 列和第 3 列所示。第 1 列考察了资金引导效应,第 2 列考察了风险共担效应,第 3 列考察了政治关联效应,且回归系数均在 5% 水平下显著为正,这 3 种效应的强弱依次为资金引导效应(0.013)、风险共担效应(0.009)、政治关联效应(0.007)。由此,笔者认为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说 1 得到验证。对于初创企业而言,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缓解了融资约束,投资效率越好,风险共担效应越强,投资机构对市场风险的顾虑越低。更

重要的是,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有利于区域的各类经济实体与政府构建积极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这将会为初创企业带来更多样的资源获取渠道和更完善的知识交流网络。

表 2 中第 4 列、第 5 列、第 6 列是加入了营商环境指数解释变量后的模型(6)的回归结果。第 4 列考察的是营商环境指数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条路径(资金引导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营商环境指数和资金引导效应的乘数项的回归系数为 0.063,在 5% 水平下显著,显示营商环境指数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条路径(资金引导效应)中的调节作用为正,说明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资金引导效应发挥的作用越强。第 5 列考察的是营商环境指数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条路径(风险共担效应)中的调节作用。营商环境指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 0.196,在 10% 水平下显著,营商环境指数和风险共担效应的乘数项的回归系数为 0.060,在 1% 水平下显著,显示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作用,并且营商环境指数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条路径(风险共担效应)中的调节作用也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5)			模型(6)		
	第 1 列	第 2 列	第 3 列	第 4 列	第 5 列	第 6 列
G	0.013** (0.006)			0.016** (0.006)		
E		0.009** (0.004)			0.026*** (0.006)	
R			0.007** (0.003)			0.011*** (0.003)
B				0.129 (0.104)	0.196* (0.102)	0.231* (0.120)
$G \times B$				0.063** (0.026)		
$E \times B$					0.060*** (0.019)	
$R \times B$						0.025* (0.015)
C_1	0.259 (0.161)	0.259 (0.161)	0.256 (0.161)	0.241 (0.168)	0.183 (0.164)	0.175 (0.170)
C_2	0.011 (0.013)	0.012 (0.013)	0.022 (0.014)	0.002 (0.014)	-0.004 (0.014)	0.012 (0.014)
C_3	0.145*** (0.055)	0.152*** (0.056)	0.177*** (0.058)	0.122** (0.061)	0.117* (0.060)	0.152** (0.063)
C_4	0.026 (0.018)	0.018 (0.017)	0.021 (0.017)	0.047** (0.019)	0.035** (0.018)	0.044** (0.019)
常数项	1.451*** (0.164)	1.381*** (0.154)	1.459*** (0.163)	1.528*** (0.170)	1.442*** (0.157)	1.559*** (0.173)
AR^2	0.39	0.39	0.42	0.65	0.79	0.72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AR 检验报告了检验的 p 值,下同。

正,说明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风险共担效应发挥的作用越强。第6列考察的是营商环境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条路径(政治关联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和资金引导效应的乘数项的回归系数为0.025,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营商环境在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条路径(政治关联效应)中的调节作用为正,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治关联发挥的作用越强,假说2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1. 分位数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可行性以及稳健性,主要采取40分位数、50分位数、60分位数、70分位数、80分位数、90分位数检验实证回归结果,得到没有营商环境干预($G \times B$ 、 $E \times B$ 、 $R \times B$)下的检验结果(表3)。由表3可以看出,在不同分位数作用下的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是一致的,且显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个变量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只有各个变量之间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验证在营商环境干预条件下,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引导效果、投资效率及政治关

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以 $G \times B$ 表示在营商环境干预的条件下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引导效果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E \times B$ 表示在营商环境干预的条件下基金投资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R \times B$ 表示在营商环境干预的条件下基金政治关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40分位数、50分位数、60分位数、70分位数、80分位数、90分位数检验实证回归结果。表4的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表明实证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2. 不同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分别采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弱工具变量问题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对异方差更有效率的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由表5可知,上述方法的检验结果均是一致的,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结 语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基于系统论中要素的供给与联结的优化能够提升系统功能的观点,运用系统GMM模型对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营商环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创投引导基金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较低的营商环境水平会抑制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对经济高质

表3 分位数稳健性检验

变量	40分位数	50分位数	60分位数	70分位数	80分位数	90分位数
G	0.006*** (0.007)	0.001*** (0.007)	0.002*** (0.009)	0.008** (0.011)	0.003** (0.013)	0.006** (0.009)
E	0.003** (0.005)	0.003** (0.005)	0.008** (0.006)	0.017** (0.008)	0.020** (0.009)	0.019*** (0.006)
R	0.007** (0.003)	0.009** (0.004)	0.008* (0.005)	0.011** (0.006)	0.006** (0.007)	0.009* (0.005)
B	0.155* (0.109)	0.250** (0.118)	0.441*** (0.143)	0.486*** (0.182)	0.427* (0.221)	0.646*** (0.145)
C_1	0.108 (0.163)	0.112 (0.178)	0.037 (0.214)	0.009 (0.274)	0.586* (0.333)	0.077 (0.218)
C_2	0.025* (0.014)	0.016 (0.015)	0.004 (0.018)	0.001 (0.024)	0.022 (0.029)	0.009 (0.019)
C_3	0.102* (0.059)	0.111* (0.064)	0.032** (0.078)	0.050** (0.099)	0.086** (0.120)	0.090** (0.079)
C_4	0.002* (0.018)	0.002* (0.020)	0.010* (0.024)	0.028* (0.030)	0.073** (0.037)	0.086*** (0.024)
常数项	1.255*** (0.164)	1.188*** (0.178)	1.162*** (0.215)	1.386*** (0.275)	1.597*** (0.333)	2.131*** (0.218)
AR^2	0.62	0.66	0.78	0.82	0.67	0.72

表4 含交互项的分位数稳健性检验

变量	40分位数	50分位数	60分位数	70分位数	80分位数	90分位数
G	0.011* (0.006)	0.004** (0.008)	0.002** (0.009)	0.005** (0.011)	0.002** (0.011)	0.013** (0.010)
E	0.005** (0.006)	0.012** (0.008)	0.020** (0.009)	0.028** (0.011)	0.032*** (0.012)	0.031*** (0.010)
R	0.005** (0.003)	0.008* (0.004)	0.007** (0.005)	0.006** (0.006)	0.006** (0.006)	0.007** (0.005)
B	0.053** (0.109)	0.212* (0.144)	0.333** (0.166)	0.237** (0.190)	0.238** (0.204)	0.497*** (0.174)
$G \times B$	0.044** (0.028)	0.023* (0.038)	0.028* (0.044)	0.020* (0.050)	0.015** (0.053)	0.028** (0.046)
$E \times B$	0.008* (0.018)	0.019** (0.024)	0.037** (0.028)	0.046** (0.032)	0.056*** (0.034)	0.056* (0.029)
$R \times B$	0.002** (0.017)	0.005** (0.022)	-0.004* (0.026)	0.031* (0.029)	0.049** (0.031)	0.037** (0.027)
C_1	0.070 (0.154)	0.246 (0.203)	0.141 (0.235)	0.160 (0.268)	0.609** (0.288)	0.349 (0.246)
C_2	0.014** (0.013)	0.001 (0.017)	0.001 (0.020)	0.013 (0.023)	0.006 (0.024)	0.004 (0.021)
C_3	0.138** (0.057)	0.094** (0.075)	0.091** (0.087)	0.182* (0.099)	0.204* (0.106)	0.116** (0.090)
C_4	0.017* (0.018)	0.020** (0.024)	0.023** (0.027)	0.046** (0.031)	0.099*** (0.033)	0.123*** (0.029)
常数项	1.310*** (0.162)	1.218*** (0.214)	1.264*** (0.248)	1.654*** (0.283)	1.946*** (0.304)	2.309*** (0.259)
AR^2	0.58	0.69	0.74	0.52	0.83	0.62

表5 不同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2SLS 估计法	LIML 估计法	GMM 估计法
G	0.259* (0.0336)	0.229** (0.0312)	0.180** (0.0391)
E	0.023*** (0.012)	0.056** (0.033)	0.211** (0.030)
R	1.890*** (0.307)	1.720*** (0.925)	1.823*** (0.863)
B	0.024* (12.800)	0.029* (6.402)	0.014* (8.343)
C_1	0.021* (11.631)	0.047** (11.632)	0.091 (11.212)
C_2	0.215* (10.279)	0.195* (8.379)	0.223 (10.987)
C_3	0.318** (14.001)	0.325* (15.006)	0.209* (15.035)
C_4	0.680** (16.10)	0.702** (16.10)	0.899** (16.42)
常数项	0.188*** (15.402)	0.265*** (15.203)	0.650*** (15.400)
AR^2	0.92	0.93	0.89

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和政治关联效应发挥的作用越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在推动宏观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就是资

源供给和制度供给对主体资源依赖的打破,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提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重点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的联结机制,促使多重要素有效相互联结,实现系统功能跃迁。可以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加快完善支撑企业投资发展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内需来保障资源供给在系统功能升级中的效应,特别是通过持续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更好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在支持微观企业发展中的杠杆作用,综合提升各项政策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效能。

第二,建设完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制度与资源之间需形成共轭驱动的螺旋上升关系,制度供给作为要素供给发挥效用的“催化剂”,要素供给作为制度供给发挥作用的“强心针”,两者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政府创投引导基金除了具备资源供给效应,还兼具制度供给的作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完善政府创投

引导基金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优化,降低“挤出效应”,提升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资金引导效应、风险共担效应和政治关联效应,更精准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营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高效运行的社会环境。外贸依存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为此各级政府一方面需要及时主动抢抓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契机,有针对性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提升外资外贸水平,倒逼营商环境优化完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激活人力资源增量、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积累经济发展技术与知识力量,打牢高质量发展系统运行基础,如,通过教育改革来改善优化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虽然通过多渠道收集数据,尽力避免同源方差的影响,但数据的主体部分无法形成跨行业对比,结论的普遍性需要多行业数据的验证,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展多行业的对比研究;二是,结果变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可以将财务绩效、社会效益和创新绩效作为结果变量进行研究,探究相应规律和机理。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李强作重要讲话[EB/OL]. [2022-12-16]. http://www.gov.cn/xinwen/2022-12/16/content_5732408.htm.

[3]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and 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作深入解读 [EB/OL]. [2022-12-19]. http://www.gov.cn/xinwen/2022-12/19/content_5732626.htm.

[4] 国务院常务会议 [EB/OL]. [2022-06-29] <http://www.gov.cn/guowuyuan/cwhy/20220629c19/mobile.htm>.

[5] 国务院常务会议 [EB/OL]. [2022-09-07] <http://www.gov.cn/guowuyuan/cwhy/20220907c27/mobile.htm>.

[6] 官义飞,张可欣,徐荣华,等. 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融资造血”功能吗[J]. 会计研究,2021(4): 89-102.

[7] 刘璟琨,胡宇佳,李钰. 2022 年政府引导基金专题研究报告[R]. 北京:投中研究院,2022.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EB/OL]. [2022-11-08] http://www.gov.cn/xinwen/2022-11/08/content_5725322.htm.

[9] 洪银兴,刘伟,高培勇,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笔谈[J]. 中国社会科学,2018(9):4-73.

[10] 方凤玲.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十七次学术研讨会综述[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12(2):209-213.

[11] 刘志彪. 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 学术月刊,2018,50(7):39-45.

[12] 高培勇,杜创,刘霞辉,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J]. 经济研究,2019,54(4):4-17.

[13] 余泳泽,杨晓章,张少辉.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转换特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6):3-21.

[14] 刘清华. 区域科技金融服务联动机制构建——以重庆市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2018,38(21):47-55.

[15] 洪银兴. 资源配置效率和供给体系的高质量[J]. 江海学刊,2018(5):84-91.

[16] 韦东明,顾乃华,魏嘉辉. 财政垂直失衡、公共支出偏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评论,2021(2):23-43.

[17] 王辉,汪炜.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现政策目标了吗? [J]. 科学学研究,2022,40(6):1044-1053.

[18] 刘友金,周健. 变局中开新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2):63-70.

[19] 任保平,豆渊博. “十四五”时期新经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与政策[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37(1):10-22.

[20] 沈坤荣,乔刚.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22,36(10):1-8.

[21] 戴双兴. 数据要素:主要特征、推动效应及发展路径[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6):171-177.

[22] 陈抗,战绍磊. 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高质量协同发展:机理、绩效与路径[J]. 经济纵横,2021(1):79-89.

[23] 冯烽. 开发区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支点作用与提升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2021,43(7):61-68.

[24] 刘军,付建栋. 营商环境优化、双重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21(4):

70-89.

- [25] 后向东. 论营商环境中政务公开的地位和作用[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2): 17-22.
- [26] 钱锦宇, 刘学涛. 营商环境优化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政府机构改革: 功能定位及路径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9(3): 86-93.
- [27] 宁朝山. 中国区域制造业质量差异及其收敛性——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23): 98-101
- [28] 于文超, 梁平汉. 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11): 136-154.
- [29] 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9, 54(4): 84-98.
- [30] 冯涛, 张美莎. 营商环境、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6): 147-153.
- [31] 许志端, 阮舟一龙. 营商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123-134.
- [32] 杨敏利, 焦飞飞, 董建卫, 等. 引导基金联合参股的杠杆效应研究[J]. 科研管理, 2020, 41(10):

114-124.

- [33] 党兴华, 施国平, 仵永恒. 政治关联与风险资本筹集[J]. 预测, 2015, 34(6): 45-50.
- [34] 冯冰, 杨敏利, 郭立宏.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对创业企业后续融资的影响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 2019, 40(4): 112-124.
- [35] 刘志彪. 平等竞争: 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之本[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4): 41-47.
- [36] 杨敏利, 丁文虎, FELDMAN M W. 引导基金参股方式对创投机构后续募资的影响[J]. 科研管理, 2020, 41(5): 131-139.
- [37]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 56-71.
- [38] 刘思明, 张世瑾, 朱惠东. 国家创新驱动力度及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4): 3-23.
- [39] 王文举, 姚益家. 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经纬, 2021, 38(3): 86-94.
- [40] 聂长飞, 冯苑.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0(5): 97-108.

(收稿日期: 2022-01-27 编辑: 陈玉国)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 New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SHI Anna^{1,2}, LIU Xijia¹ (1.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 enterprises with financial instruments. With the increasing effect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leverage role of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 and other financial resources to leverage social fund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the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re used as proxy variables to measure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us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ith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8 to 2020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systematic GMM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aths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ak resource supply weak institutional supply - weak resource supply strong institutional supply - strong resource supply strong institutional supply-system function improvement” path and “weak resource supply weak institutional supply-strong resource supply weak institutional supply - strong resource supply strong institutional supply-strong resource supply strong institutional supply - system function improvement” path. These two paths both break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structural dependence and process depen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ystem.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s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strengthe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s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gions with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s play a stronger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capital guidance effect, risk sharing effect and political correlation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ment venture capital guiding fund; business environment; resource supply; institutional supply